

 燕雀文丛

主编

尹群

新中国往事

杨波 胡悌云 程中原 陈东林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燕雀文丛·邓力群主编

新中国往事

杨波 胡悌云 等著
程中原 陈东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往事/杨 波等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1

ISBN 7-5073-2034-0

I. 新... II. 程... III. 历史事件—中国—1949~
IV. 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391 号

新中国往事

著 者/杨 波 胡悌云 程中原 陈东林
责任编辑/刘庆旻
校 对/禾 仲
封面设计/王浩洁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163097018 8225136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刷中心印刷厂

880 × 1230mm 32 开 9.5 印张 3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3-2034-0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说明

1998年至2002年间，邓力群同志在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过程中，编辑了大量参考资料。编审万光明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想每年选一些出版，后来拖下来了。

现在把这些参考资料选出一些，也少量吸收其他相关资料，作为《燕雀文丛》出版。燕雀书店关德民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燕雀文丛》是一流学术成果，有长期的理论积累、资料积累和研究积累，适合喜欢思考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阅读。

编 者

2005年5月31日

1998年至2002年间，邓力群同志在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过程中，编辑了大量参考资料。编审万光明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想每年选一些出版，后来拖下来了。

现在把这些参考资料选出一些，也少量吸收其他相关资料，作为《燕雀文丛》出版。燕雀书店关德民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燕雀文丛》是一流学术成果，有长期的理论积累、资料积累和研究积累，适合喜欢思考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阅读。

编 者

2005年5月31日

目 录

- 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 丁 明 整理 (1)
- 1949年毛泽东为何未能下令进攻台湾 陈东林 (19)
- 农奴的胜利
——纪念西藏平息叛乱暨民主改革
40周年 多杰才旦 (43)
- 新中国治理黄河事业的伟大开端
——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的
回顾与思考 段德文 张孟军 李宏杰 (65)
- 关于“大跃进”的历史分析 胡悌云 (74)
- 三年困难时期的形成与克服 胡悌云 (117)
- 《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的历史意义 齐兆舜 (149)
- 准备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 李正华 (156)
- 改革的起点：1978年中国经济制度 郭铁成 (175)
- 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
——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
巨大贡献 杨 波 (188)
- 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胡乔木书信集》简介 朱元石 (224)
- 不知疲倦的“歌者”
——《胡乔木诗词集》简介 程中原 (266)
- 听父亲纪登奎谈人生经历 纪坡民 (290)

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

丁 明 整理

1997年10月22日~25日，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5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美国、德国、挪威等国学者24人，30余名国内外学者列席会议。与会人士中除长期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外，还有一些直接参与中苏最高层会晤的当事人，如来自俄罗斯的杰留辛、库里克，曾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李越然、阎明复。大会共收到论文30余篇，用于交流的各种档案资料汇编10余种。论文涉及战后至70年代中苏关系的主要方面，包括中苏同盟的形成；中苏关系的演变、分裂及其原因；中苏关系与国际冲突；中苏经济关系；中苏领导人与中苏关系；新档案材料的发掘与利用等等。由于会议组织者的努力，入选论文所阐释的新观点或新视角，大都能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从而丰富并深化了关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认识。会议期间，组织者及时地抓住中苏关系亲历者与会的难得机遇，于10月24日下午，邀请他们就自己的所见所闻直抒胸臆，并现场解答学者们的提问。他们的回忆不仅生动具体，而且妙语连珠，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现将这次对话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其中两位俄国学者的发言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主持人陈兼（中国旅美学者，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来了四位先生，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先把四位先生给大家作一个介绍。阎明复先生和李越然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曾经作为翻译，长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杰留辛先生是《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记者，后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任职，现任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先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现任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四位先生将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在一起，讨论中苏关系的若干重要问题。下面，先请他们每人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围绕几个书面问题简单地谈一谈个人的看法，然后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其他普遍关心的问题。

阎明复：我先把四个书面问题给大家念一下：

(1) 何时以及什么是中苏关系当中从友好走向敌对的关键性转折点？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是1958年的“共同舰队”或“炮击金门”？还是1960年的“撤退专家”？

(2) 怎样看待1960~1961年的中苏关系？当时双边关系的改善是表面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为什么这种改善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恢复？

(3) 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喜欢对方？在对方领导人当中，毛与赫比较喜欢什么人？

(4)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是否有真正改善的机会？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否同中国国内政治的革命化有关联？

我建议请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先来回答。

杰留辛：我们在战争时期有一个口号，叫做：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现在我们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既然阎明复先生要求我这样做，我只好第一个来回答。当然，我只能谈一谈我所知道和了解的情况。

先谈一谈中苏冲突。关于冲突的开端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信件当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在毛泽东的另外一些谈话当中，他还谈到过，他对斯大林的不满从20年代就开始了。有一次，在和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他说要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斯大林曾经反对过中国革命。他说这本书很可怕，因此要在他死后一万年才能发表。

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双方就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以前讲过的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设备的估价问题；人民币和卢布的比值问题，等等。但这些分歧在当时都得到了解决，因为中苏双方都为此作出了让步。

1957年，在莫斯科批判了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中国方面对此的反映并不强烈。同样，中国1956年4月和12月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在莫斯科也没有得到强烈的反响，尽管莫斯科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并出版了小册子。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问题，是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内容，但并不是主要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是愿意考虑中国同志的意见的。

我记得，1957年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时，在“苏维埃宾馆”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恩来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我当时是《真理报》记者，总编辑告诉我，可以坐在他们身边，把他们所谈的事情记录下来。今天在座的李越然先生当时也在场，给周恩来当翻译。两人先谈天气如何如何。赫鲁晓夫那一天喝了很多酒，周恩来开始没有喝，后来也喝了。按照俄罗斯的习惯，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干杯，喝得够饿了。这时，他突然说道，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这话，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感觉很惊讶。我于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回到编辑部以后，党中央来了一个电话，说赫鲁晓夫今天的讲话应当立即在《真理报》上发表。我之所以谈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赫

鲁晓夫当时并不希望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妨碍同中国同志的关系。我认为，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还是好的。

如果说到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方面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再就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和反对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好的关系。但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协调，可以解决的。可是后来双方争吵起来，骂起来了。

赫鲁晓夫有时也会突然清醒，认为和中国人的争吵应当缓和下来。于是就下令，停止和中国人的一切争论。但是不久，我们从北京得到消息，说那里又在骂赫鲁晓夫了，管他叫“赫光头”。赫鲁晓夫听了以后认为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争论于是重新开始。双方几乎在所有方面，在所有层次上吵起来了。开始时，我们在写文章，起草决议草案时，上边曾经规定了一条，这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污辱中国人民，不能否定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但是在做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忘记了这一条。有一次，我碰见一个报社的总编辑，问他为什么不遵守上边的这条规定？这个总编辑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回答我说，规定是规定，但并没有给我直接的指示呀。

尽管赫鲁晓夫有时也说，我们两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因素要超过把我们分裂开来的因素，但是争论的“战火”还是越烧越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个人的特性，例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有就是办事过分的主动，过分的积极，好走极端，而这一切又都不能用理智来控制，就把事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了。

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以后，刘少奇在苏联继续访问，并在莫斯科举行了友好大会。会前，我们给赫鲁晓夫准备了一个讲话稿，当时赫病了，由别人代他来念。讲话稿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俄国的沙皇和中国的皇帝可以吵架，但绝不能容许两国人民来吵架。刘少奇回国时，经过伊尔库茨克时，也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容许任何人使中苏两国人

民吵起来，也不能原谅挑唆我们吵架的人。刘少奇的这一篇讲话是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苏联的报纸上没有刊登。于是我们看到这篇讲话的人就在猜测，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的“挑唆”和“不能原谅的”人指的是谁，是指赫鲁晓夫呢，还是指其他人。

第二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这一分歧的产生是很奇怪，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开始赫鲁晓夫总想讨好毛泽东。阎明复先生曾经谈到，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特意为他安排了非常豪华的房间和床，这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讨好毛泽东的表现。但是他的讨好做得太过分了，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我们把这个称做“傻瓜的服务”。

后来，双方在讨论会见的时间安排时，毛泽东提出，会见在凌晨三四点钟进行。赫鲁晓夫得知后又生气了，说不要再搞斯大林这一套做法了。斯大林时代就是半夜才上班的。类似这样小的摩擦说明他们在个性上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逐渐积累起来就会爆发。而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人们就无法相互尊重了。

在他们两人的不和当中，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要有修养得多。赫鲁晓夫是一个粗鲁的、没有太多教养的人。

主持人：很对不起，杰留辛先生，因为每个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想请其他几位先生也来谈一谈。下面，先请李越然先生谈。

李越然：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我看了前面念到的几个书面题目，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大的题目。在这些问题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咱们今天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给所有的人一个满意的回答，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很赞同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我认为这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见解，这段话是小平同志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讲的：我今天不是谈我们过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问题，如果谈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也不认为我们当时讲的都

是对的。至于说哪些东西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了。

我只能按照这个书面题目，讲一讲我的个人感受。像我这个年龄，直接参与过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不多了。在座的各位学者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求同存异”吧。

我认为出这四个题目的人，他的头脑中就有一个框框，总是框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1958年的“共同舰队”；1960年“撤专家”，这些实际上都是人所尽知的事情。而中苏两党的分歧，在两党关系最好的时候，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有。毛泽东同志性格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对斯大林都敢于讲不同意见，至于对赫鲁晓夫如何，就不用我做解释了。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很勇敢，揭开了许多压在人们头上的盖子。所以我觉得，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批判他的错误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赞同的。但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把斯大林骂成“希特勒”，我们则坚决不能同意。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发表的那两篇文章，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相当负责任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当时中共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做法，直接引发了“波匈事件”，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大的思想混乱。

尽管如此，在1957年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这个时期，中苏两党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好的。毛泽东当时在会上的讲话是我给翻译的。我记得当时毛泽东曾经对坐在他对面的赫鲁晓夫讲过，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的好看，我们就是来扶你

的。另外，毛泽东在我们党内也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多灾多难，我们应该给他以相应的支持。所以，对于外界的一些说法，例如说毛泽东不尊重赫鲁晓夫，等等，我个人是不赞成的。

到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谈“共同舰队”问题，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问题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一次的翻译是由我和阎明复两人担任的。毛泽东的讲话归我翻译，赫鲁晓夫的讲话归阎明复翻译。

赫鲁晓夫等人从北京南苑机场下飞机后，便直接到会场，我记得是在怀仁堂开始会谈的。会谈开始，寒暄一番之后，毛泽东就问赫鲁晓夫，你说要和我搞“共同舰队”，这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于是就开始解释，他当然也有他的一套说法了。谈到一半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说了大半天，还是不切题，我问你，到底什么叫“共同舰队”？你是不是要控制我们？你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好了！

主持人：李老，下面该请阎明复同志讲一讲了。

阎明复：我讲的比较简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毛泽东对苏共新的领导层有一个观察的过程。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作为苏共这么一个大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是不成熟的。对于苏共“二十大”作出的一些结论，毛泽东也是不赞成的。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双方把各自的观点讲透了，于是，在互相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这样才产生了“莫斯科宣言”。

我很同意刚才越然讲的观点，即：1958年发生的“共同舰队”以及类似的事情，使毛泽东感到，赫鲁晓夫仍在继续斯大林的那样一种把苏联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1955年赫鲁晓夫掌握实际权力以后，开始时曾经取消了一些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不平等的做法，像从旅顺、大连撤军；把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取消了在新疆的一些不平等做法，等等。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毛主席是满意的。但从

“共同舰队”及其他事情开始，毛主席重新怀疑赫鲁晓夫是否还在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

从1957年开始，主席在国内实行越来越激进的路线，集中的表现是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在全国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等等，这些做法在苏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瞧不起毛泽东，后来逐步升级。随着中苏关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像“炮击金门”，赫鲁晓夫对此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中印边境事件，苏联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庐山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通知中共，拒绝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而此时正值彭德怀元帅在庐山批评主席；还有就是这个时期，赫鲁晓夫推行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政策，而中国当时则把美国当成是头号敌人。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到我国来参加国庆1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国庆宴会上，主席原来准备讲话，后来拿到赫鲁晓夫的讲话稿，越然给主席翻译，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就是：“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主席当场就决定不讲话了，临时改由总理讲话。

此后双方进行了谈判。苏方参加谈判的是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会谈过后，苏方给我们来了一个通知，说这次谈判是很不愉快的，希望把会议记录销毁，不要留给我们的后人。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上边有参加这次会谈的两国领导人，我和越然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是1995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俄国朋友们给我的。在这次会谈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尖锐程度可能超过了历次会谈。我这一次来开咱们这个会的时候，陈兼先生告诉我，说苏共中央并没有销毁这个记录。现在这个记录在俄国的档案馆已经解密了。这就是说，他们让我们销毁，而他们自己却没有这样做。

1960年初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康生去参加了。在这个会议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大骂毛泽东，从此以后中苏关系就不可收拾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 1961 ~ 1962 年的中苏关系。1960 年，经过大家的努力，莫斯科会议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参加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在经过中央同意后，向苏联领导人表示，双方应努力改善中苏关系。正是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防止了双方在国际论坛上爆发新的争论。这些措施包括把在国际论坛场合，例如把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中方代表团撤回来；在裁军大会上，采取了同苏联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暂时的休战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根本解决。所以，我认为，当时的改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李越然：我来谈一谈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如此互相不喜欢对方？在对方领导人当中，毛与赫比较喜欢什么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毛与赫的关系，不是他们两人之间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两个大党的领袖。赫鲁晓夫这个人我是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之后，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陪同周恩来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时见到他的。1954 年他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我也见过他。1954 年赫鲁晓夫做了几件很对的事情，刚才明复同志讲了，我不在这里重复。有一次，我参加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很感谢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予我们的无私援助。这完全是毛泽东发自内心的话。赫鲁晓夫听了以后，也讲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他说，我们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因为我们援助了中国，中国强大了，反过来也就是对我们苏联的支持。这句话说的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我个人的看法，赫鲁晓夫是一个大国的领袖，他的思想很敏锐，反应也很快。我们确实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来尊重他。我们也不应该笼统地随便地把他否定掉。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坐在一起，他们不是同水平的人。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出于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对毛泽东的思想感情。毛

泽东同志有不少错误，我们不能把他的错误当做真理。但是，当他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我给他们当翻译时，把他们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两人之间，在思想水平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比如，1958年的会谈，有一次是在游泳池进行的。两人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谈到国际关系的时候，赫讲，毛泽东同志，我们对欧洲的情况比较熟悉，你们对亚洲的情况比较熟悉，还是我们管欧洲，你们管亚洲吧。毛泽东马上摇摇手说，这可不行。

还有一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以后，见到赫鲁晓夫，就问他，其他的共产党代表团都来了吗？赫答：都来了。毛接着问：南斯拉夫代表团来了没有？赫答：没有。我们给铁托发了请帖，但他回信说不参加了。这样显得他很失礼，因为我们邀请了他。他如果真来的话就好了，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批他一下。毛泽东说，这样不行。我们在兄弟党之间不能搞这个。南斯拉夫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了，斯大林整铁托整得够苦的了。铁托一肚子气，到这里来说一说，大家沟通沟通，交流交流不是很好嘛。实际上，毛泽东只差一句话没有说了，这就是：我支持你，但是你绝不能再搞斯大林那一套了。这件事也反映了赫鲁晓夫愚蠢的地方。

主持人：下面请库里克先生谈。

库里克：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即中苏分歧产生的原因。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就出现问题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为什么会在50年代中期产生如此尖锐的分歧？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分歧正是两国关系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产生的。当时，相互之间的协议在一个接一个地顺利签署，成百个建设项目的协议在一个一个地付诸实施。文化方面的各种交流也很频繁。突然，像晴天的响雷一样，双方出现了分歧。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了20年，其中16年是在中国处担任处长。在这20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

题，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甚至异想天开的设想。其中之一是：双方根本没有出现分歧，而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协议，要做出一种出现分歧的样子给西方人看。这个设想当然是很天真的。但是实际上，西方人确实很长时间不相信中苏两国会吵架。

许多人都曾经提出关于中苏分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如领袖欲望的竞争啊，经济交流关系的不平等啊，等等。事实上，我们的领袖们也不一定清楚关系恶化的原因。我听说，有的时候，赫鲁晓夫本人也很懊丧，他曾经在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里抱怨过，中苏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担任总理的柯西金，他的文化程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比赫鲁晓夫要高。1969年，柯西金曾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去越南的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我也是这个代表团的一个随行人员。我知道得很确切，离开莫斯科之前，没有任何到中国去的设想。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技术上的需要，我们中途在杜尚别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参加葬礼，这一次的河内之行并不好受。大家都感觉累了，想放松放松，喝点啤酒之类的。当时柯西金在另外一间房子里，不在场，我们则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了。突然，这个时候，柯西金进来了，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都很奇怪，我们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贾丕才叫过去，他当时是苏联外交部的第一远东司司长。这以后，大家才知道我们这是在向中国飞行。本来，柯西金想在河内的时候会晤周恩来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会见成。于是，他就从河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请示他，说是他在河内没有能够和周恩来会面，因此想到北京去谈判。当时除了谈判，没有别的出路，两国不能老打仗啊。柯西金叫我们几个人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边界问题。到了北京，在飞机场举行了会见。周恩来对谈